

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

冯 尔 康

摘 要:清代徽州贤媛中有人以不婚、晚婚侍奉老亲,极力支撑濒危的家庭,使得老人能够安度晚年,寿终正寝;更有贫困人家的寡妇、主妇、女子,凭借女性特长,靠纺织、缝纫、刺绣获取生活来源,还像男人一样做塾师、堪舆师或卖画,养家糊口,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以至培养儿子成才,光大门庭。她们治家的才能,表明女性具有很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其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成为不争的事实。江浙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徽州贤媛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女性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够具备文学艺术技能,必要时用作谋生手段;二是江浙人家有闺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文艺产品提供出路,借以维持生存。

关键词:徽州贤媛;生存环境;生存术

人生在世,都有着能否生存、如何生存的问题,对于女性,尤其是贫穷寡妇、贫困人家女子就来得极其严峻。对历史上女性独立解决生存之道的学术研究似乎尚不多见,笔者试图将所知的清代徽州贤媛顽强生活状况及其能量呈现出来,与同好共享,以期深入探究。

笔者考察了清代徽州贤媛中贫乏人家的孀妇、主妇、女子是如何维持生命、延续家庭的;她们的维生手段为何,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造就、成就了她们;明了她们在男性社会中,凭借女性特长,靠纺织、缝纫、刺绣获取生活来源,像男人一样做塾师、风水师或卖画,支撑了家庭,以至培养儿子成才,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她们自谋生路,不屈不挠,不低三下四地求亲靠友,其自尊自爱的精神受到社会尊重。

在清代,女子的籍贯从属于父、夫,所谓徽州贤媛,是指父家和夫家任何一方是徽州籍(包含徽州原籍、徽州人寄籍他方、外地人寄籍徽州、徽州商人在外地获得商籍)的女子。所以徽州贤媛中许多人并不生活在徽州,而是在侨居地,主要是在江苏、浙江,尤其集中在杭州、扬州和苏州。江浙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对于徽州贤媛文化知识的

获取与运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一、女承子职赡养老亲,不婚或晚婚

在室女为双亲终身不婚配,或老大不嫁,在清代虽是罕见的现象,但在徽州才女中确有其人。她们面对或贫或病,或贫病交加的老亲,不忍离弃,在室侍奉,女承子职,维持家庭,使父母得终天年,而她们自身经历惨痛,做出人生极大的牺牲。

孙旭嫫,字晓霞,父亲孙云朝,歙县人,诸生,居住无锡,家贫窶。为生存下来,孙旭嫫决心不出嫁,留在家中养活父母。《梁溪诗话》叙述她的经历:“云朝夫子而贫,晓霞侍养不嫁。针绣所得,以供甘旨,复精岐黄术。亲歿,居邑之楼巷,颓垣斗室,吟咏自怜,年八十余卒。”^[1](P46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孙旭嫫断然采取不结婚的办法,留在家中,用给人家缝纫、刺绣的收入,供养亲人饮食。她懂得医术,很可能兼靠给人治病来补充家庭生活费之不足。她还以女红养家,在其诗集《峡猿吟草》中有明确的道白。《初夏感怀》咏道:“漫将针线疗奇穷,九十韶光瞬息中。事遇伤心人易瘦,诗摹变体句难工。生憎柳絮因风起,不

收稿日期:2014-12-18

作者简介:冯尔康,安徽大学(合肥 230039)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忿桐花为雨空。过眼繁华皆火石，莫将荣落怨天工。”^①她的家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奇穷”，她靠勤劳灵巧的十指为双亲养老送终，度过近 90 年的人生。诗中透露她的人生态度豁达开朗，窘迫中坚强自持，不羡慕荣华富贵，对自家的苦痛不怨天尤人。当然，有时心情不好，对备受折磨的人生有生不如死的感叹，是以在《忆亡妹》中说：“惨魂休恨招无意，犹胜生存苦备尝。”^{[1](P463)}她有愤慨，如《写怀》所抒发的：“福慧难兼信不误，万千磨折我何辜。”^{[1](P463)}对世事的不公，有时发出怨恨不平之声，在《阅旧稿有感》中感叹：“不得其平便欲鸣，抚今追昔几心惊。旁人莫作闲情看，我自饥寒过一生。”^{[1](P464)}她的心不能平静，有怨气，但对侍养双亲上毫无怨言，她为父母和自身的生存，做到了自食其力，解决生计问题，只是付出终身独身的沉重代价。

与孙旭嫫不同，王玉芬的当初不结婚，并非家境贫乏，纯粹是为侍奉双亲。她的父亲王凤生，婺源人，侨寓江宁。王玉芬，字华云，著有《江声帆影阁诗》。她在弟弟出生以前矢志不嫁，表示终身服侍父亲。恽珠（1771—1833）辑的《国朝闺秀正始集》选录她的诗，记其身世云：王凤生“年逾五十无子，华云矢志不嫁，将终身事父”^{[1](P545)}。她的多首诗表达出在父亲任所随侍情形及对其父身体的关注、担心，如《思亲》所吟：“官阁沉沉夜漏时，白头亲远最萦思。凭栏为语庭前竹，待报平安入梦知。”^{[1](P546)}及至道光七年（1827 年），弟弟出生，带来全家的欢欣，她吟出《丁亥正月弟生志喜》：“频年菽水强承欢，长念亲衰泪暗弹。戏剧唬声试雏凤，从今慈竹总平安。”^{[1](P547)}弟弟出生，王玉芬并没有立即出嫁，而是待弟弟稍长，乃放心与南河同知严逊结缡，然而年岁大了，只好做填房。王玉芬为照料老父耗尽青春，作诗《自叹》：“回首年华去似梭，思亲老境苦消磨。显扬到我知无分，珍重光阴膝下过。”^{[1](P548)}她不是为了得到“孝女”的名誉，完全是替父亲健康着想，是一度女承子职的。

与王玉芬有某种类似境遇的汪观定（1886—1922），是为亡故的双亲抚养幼弟而晚婚的。她是原籍婺源、钱塘商籍、知县汪纬的女儿，11 岁时双亲患病，两次割股疗亲，无效，父母故世，留下第四、第五两个年仅几岁的弟弟，此时，“环境之险恶，过于虎穴针毡”^{[1](P535)}，汪观定挺身担起家

务，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21 岁才结婚，也是做填房。^{[1](P536)}王玉芬、汪观定均为报答父母，毅然延误自己的婚事。

徽州才女孙旭嫫、王玉芬、汪观定以不婚、晚婚，或侍奉老亲，使得老人能够寿终正寝，或抚育幼弟成长，保全了濒危的家庭。

二、靠文化艺术知识承负维持家庭的使命

孙旭嫫靠女红兼及医术维生，徽州贤媛中贫穷寡妇同样以女红谋生，更用文化知识、绘画艺能、堪輿技能、演艺技能养家糊口，培养儿子成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1. “为闺塾师以自给”。男性塾师为人们熟知，女塾师则鲜为人知，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成功地女塾师的研究开了头。生活在江南的徽州贤媛有女塾师出现。陷入吕留良案的士人眷属、休宁人江文焕就是闺塾师，她的丈夫是无为人黄补庵（字耕乎），《清诗备采》说他们夫妇创业：“耕乎善画，兼以医名，文焕开设女馆，工诗画，复精小楷，衣食颇饶，创成家业。”^{[1](P64)}原来江文焕富有文化艺能，小楷精美整洁，诗画都是行家，撰著《紫蓬山房诗抄》，有此才能，开设女馆，一定能够吸收众多女弟子；而黄补庵又能行医，所以收入丰盈。然而，黄补庵汉民族意识强烈，作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2](P496)}黄又是吕留良私淑门人，因此在吕留良案中死于监狱，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3](卷 89, “七年十二月丙午条”)}江文焕被发配直隶涿州，为旗人苏姓奴仆，遂不可能再开设女馆。^{[1](P64—65)}江士燮在歙县家乡，早寡，穷而教书，就是汪启淑在《搨芳集》中说的：“家徒四壁，为闺塾师以自给。”^{[1](P453)}明白无误地道出她是以教书作为谋生手段。她著有《翠云轩诗稿》。^{[1](P453)}石氏，苏州人，当太平军进入苏州，石氏与姊妹投城河，遇救，与婺源人朱文玉缔结姻缘，夫妇以诗词唱和，著《潜渊吟稿》。朱文玉死于杭州，石氏遂到丈夫故里婺源罗田，“设家塾，课蒙学”，且生有三个子女，亲自课读。^{[1](P529)}程氏，夫婿歙县人汪本，夫亡后，《歙事闲谭》谓：“程纱幔传经，训族邻

^① 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 463 页，黄山书社，2010 年。孙旭嫫的诗为汪启淑的《搨芳集》选入，此集出版在乾隆五十年（1785 年），孙氏当生活在此年之前或稍后；她作有《癸丑除夕》七律，癸丑年，与其生存时间相配的有康熙十二年（1673 年）、雍正十一年（1733 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她享年近 90 岁，当生活在康、雍、乾时期。

子弟，跻高龄终。”^①明确道出程氏以闺塾师维生。男性读书人做塾师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上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禁忌，虽有开通的父母聘请年老的男性塾师给女儿教书，不过女塾师应当更受欢迎，江文焕、江士燦、石氏等人做闺塾师，虽是不多见的现象，但也表明知识女子已然以教书为职业了。

2. 徽州贤媛的书画，为欣赏者收藏。休宁人汪亮，号采芝山人，祖父文柏，以诗画出名。汪亮传承家学，又在桐乡得到山水画名家张瓜田的指导，画作设色淡雅，遂“以丹青擅名”。结縲桐乡秀才费树榎，唱和自得，然“遭家多故”，丈夫早逝，生活没有着落，所幸有绘画技能，更是乐于作画，晚年侨居嘉兴天带桥，以卖画为生。这种经历，在其《写山水颇觉适意，系以长句示表妹赵夫人》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苍龙吸海鲸饮川，飞来喷我不枯之砚田。浓云湿翠满衣袖，俄顷尺幅堆苍烟。心识大块有稿本，不觉腕底吐出真林泉。妙笔墨外而为挥洒如意转觉心茫然。吁嗟乎！老大自悲雪满颠，凡骨苦炼难期仙。烟云或可作供养，吾当藉此终残年。”^{[1](P536)}她作画，有神来之笔，绘出自家满意的作品，但是满头白发，犹自以砚为田，不免心酸，然而兴趣与需要，支持她绘画不辍。她的诗词画作得到名家赏识，也因此与名流交往。她得老师张瓜田引介，成为休致在乡的刑部侍郎钱陈群的诗赋私淑弟子^{[1](P536-539)}，而钱陈群还是乾隆帝的“诗友”。大名人的私淑弟子的画作无疑更值钱。陕西三原人员琳，能诗工画，著《奄余集》，与居住扬州的歙县人程存仁结婚。程家非常贫乏，丈夫死后，她也困饿而死。她的兄长员燾在扬州“书肆画角”见到妹妹的两方小印，员琳可能也卖字画。^{[1](P495)}不知什么原因，她没能凭自家艺能维生。所以谋生不仅靠技艺，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能力。

3. 堪輿师中也有女性，虽罕见，徽州贤媛有之。康熙间婺源某女士，出嫁江西人，能写诗，精通堪輿术，夫亡，与弟弟到湖北谋生，为人家选择阳宅、阴宅、水井，据说颇有灵验^{[1](P527)}，也即被客户认可。堪輿师选地址，需要使用风水罗经，这种仪器，又以徽州休宁万安镇制造的最好，名曰

“徽盘”，这就是《橙阳散志·歙风俗礼教考》所云：“徽工首推制墨……若罗经日晷，则奇巧独擅矣。”

^{[4](P604)}本地人用本地产品最方便，婺源某女士做堪輿师得此便利。再说徽州才女中懂得术数之学的也不乏其人，如6岁读书的婺源人王瑶芬，“通文意，旁涉相人书”^{[1](P542)}。温如玉，通晓“子平之学”^②。程嫫，善写诗，“兼擅星命之学”^③。歙县江嗣阶妻梁氏，“工诗文书画，尤通《易》理，精于占卜”^{[4](P626)}。徽州贤媛中不少人懂得术数，会算命，这位婺源寡妇能够以堪輿术谋生，不足为奇。

4. 嫫妇靠针线活维生，使得针黹成为一些贫困嫫妇活命的通常手段。汪嫫(1781—1842)，字雅安，侨寓扬州的歙县人、文士汪锡维之女，21岁与亦是歙县人的程鼎调结婚，居住扬州，后因生活拮据，全家返乡；而后程鼎调只身到扬州就馆，寻即亡故，此时汪嫫35岁，儿子程葆11岁，家庭“困厄益甚”。母子的生活，大学士阮元说是“日以针黹易薪水”^{[1](P471)}，经学家刘文淇谓为“恃针黹以给朝夕”^{[1](P472)}，可知她是靠做针线活得钱维生。叶钰的《见闻果报录》记载：汪嫫“通经史，为女师，课子读”^{[4](P1057)}。可见汪嫫也做闺塾师，在忙碌的同时指导程葆读书。当程葆学业可以参加科举时，汪嫫令他到扬州舅舅汪晟家寄读。程葆以仪征籍在道光三年(1823年)中秀才，大约是在道光五年(1825年)考举人未中，族人鉴于汪嫫母子生活困苦，建议她让程葆改业赚钱糊口，在扬州的弟妹程氏怕汪嫫受人影响，写《寄怀诗》^④，认为程葆必定会有大出息，应该让他继续从事举业。汪嫫坚定地让儿子走科举之途，复诗《寄和大弟妇见赠韵》：“情致缠绵寄托深，新诗不厌百回吟。爱甥如子闻生感，何日成名副此心。”^{[1](P470-473)}程葆很快在原籍歙县于道光八年(1828年)中举，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进士，出任工部主事，将母亲迎养都城，汪嫫总算熬出来了。^{[4](P1057)}歙县人吴喜珠(?—1656)，著《吴孺人诗集》。她的经历被诗词选家汪启淑在《撝芳集》中描述为：“夫(方如麟)亡，矢志养姑教子，闺范有声。”^{[1](P484)}“养姑

① 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上册)第54页，黄山书社，2001年。学友胡中生博士解释记录中的“程纱纒”：纱纒不是程氏的名字，是蒙面纱出教学生。佩服他的理解。

② 温如玉，山西太谷人，侍读学士温启鹏之女，出嫁歙县人鲍叙昌，娘家、夫家都居住在扬州。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75—476页。

③ 程嫫，桐乡人，与歙县人、侨居浙江的鲍正勋结婚。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24页。

④ 徽州人程氏《寄怀诗》：“终年两地感怀深，想见登楼费苦吟。诗稿羞君成卷帙，米盐爱我误光阴。何时往事从头说，几度遐思窃足音。有子才如黄叔度，纵然苦节也甘心。”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24页。

教子”，说的是靠她的收入养活全家人，那么她是怎样获得收益的呢？方如麟的族人方淇荇为吴喜珠写的《吴孺人传略》说她“于甘苦茹荼中，夜必勤女红，篝灯课子，此其有功于方氏甚大，予故特著之”^[1](P484)，原来也是以缝纫刺绣为活命手段。女红养家，很不容易，可能有上顿无下顿，极其犯难，可是吴氏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如在《梦吹笛》中所吟：“残灯微焰映窗纱，罗幌风摇月半斜。梦里不知愁老大，犹将玉笛调梅花。”^[1](P484)比吴喜珠略晚的方氏，丈夫是歙县人黄家祉，三藩之乱中被诬陷入狱，家产没官，子黄曰瑚九岁，她遂“以女红佐不给，冬夏无少辍”^[4](P829)，为让儿子专心学业，甚至藏起他的鞋子，以免外出游玩，而自己不计家务的劳苦。方掌珍(1783—1839)，用女红补助家庭用度。她的父亲方鸿为歙县人、太学生，家饶裕，而夫婿贡生、塾师潘世镛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方掌珍进门，常用陪嫁首饰代为还债。潘世镛教学四方，“脩脯所入不给”，方掌珍“则以女红佐之。故家贫而菽水赖之不乏。偶岁欠困乏，几不能存”，有人劝她向娘家求助，她知道是好意，不便反驳，只是笑而不应。有时一天只能喝一次粥，天寒衣败葛，十指冻痕皴裂，仍操作不息。生六子一女，教诸子诗，兼及儿媳。她在“饥寒竭蹶之余”作《琴言阁诗抄》^①。镇江人陈蕊珠(1714—1792)，15岁时母亲故世，“日佣针黹得钱，市糕糜，抚弟妹，夜则左右挟之以寝”^[1](P418)。后来结缡于歙县人鲍皋，生养之兰、之蕙、之芬三才女，印刻与三姊妹合著的《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1](P419)主妇方掌珍、闺女陈蕊珠虽非寡妇，不过靠女红支持家庭生计的作用相同。

贫穷之家的孀妇，独立解决生存难题，做到家庭成员的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为家庭的延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维系家庭，光大门庭

传统社会的闺教包括女红和主中馈，出嫁为主妇，善于此二者者，将得到夫家人认可和赞扬，有益于家内人际关系的协调，向来被认为是家庭祥和、吉利与兴旺的征兆。尤其难得的是家境贫乏

者，孤儿寡母，凭借女红和文化知识技能在蝼蚁中奋斗，不仅维持家人生活，更能培养儿子成人，光大门庭，从而为人景仰，徽州贤媛中就有这类人物。

汪嫔被誉为歙县程氏“门户多所依赖”的家族巨人。她的治家实践，证明并非虚誉。汪嫔为人、才情、威望，对夫家的支撑作用，对程氏家族建设的致力，确有令人值得留意之处。她在《赠夫子》诗中说：“天理全从虚处领，人情须向实中求。”^[1](P489)懂得天命哲理要靠抽象思维，要富有理解力，而人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想象的，是从实际行为中观察，得到真知卓识，才能不看错人。她真正懂得人生哲学，用以处世，就会准确办好事情。她在《闺训篇》里讲女子做人准则：“男儿希圣贤，女亦贵自立。”^[1](P489)女子可贵在自立上，她自身就是典范。又说：“人生顺境少，处顺宜自识。”^[1](P489)“富贵戒骄奢，贫贱弗抑郁。”^[1](P489)深知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顺境少，逆境多，明白这种现实和自身处境，就会正确对待，富贵不淫，贫贱不馁，去营造顺境，改变逆境。她教育儿子程葆为官之道以公正、廉洁为本分，如说：“凡事据理准情，总期无愧于己，有利于物，是在虚心省察，不可偏听，不可轻举。”^[1](P489)用公正无私之心，全面观察事物，小心谨慎办理，才不废事。她理解古书的话“节以制度”，认为“古人养廉，本诸此也”，因而要求程葆：“儿善体母心，即‘节’之一言，终身守之，处己、处人，两得之也。”^[1](P489)又对儿子说，诸葛亮著书，内有八务，“戒恐惧”的内容竟有三条，武侯尚且如此，你更应慎重行事。(《清史稿·列女一·汪嫔》)汪嫔对儿媳夏玉珍的妇功要求似乎不高，让她有精力去读书学习写诗，告诉她：“羨煞神仙福地居，张华博物有谁如。嫔嫔二字形从女，闺阁如何不读书。”^[1](P489)汪嫔不只顾小家，心目中有个大家族的概念，希望这个家族兴旺发达，是以关注程氏家族建设。程氏远祖贞明有遗作，业已残缺不全，汪嫔将首尾完整部分抄录成册，妥善保存。对夫婿程鼎调的《家训》，汪嫔命子侄详细校阅，刊印成书。^②程氏先祠乐善堂，岁久渐圯，从侄学溥有志重修，汪嫔作文表示支持。侄孙士铨有才而早逝，汪嫔写作五言古诗八十韵哀伤

^① 方掌珍以诗闻名于时，陈诗的《绣余吟草序》谓徽州著名女诗人明清之际有毕著，乾嘉间有汪玉英、方掌珍，同光间为徐南苹。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36—437页、第491页。

^② 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程鼎调之兄贵州巡抚程国仁、旗人钟昌、廪生程焜、甘泉曹成序、程葆跋。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029页。原作道光甲申刊，误，甲申应为甲辰。

诗,她的表姐鲍蕊珠读此诗,如同看到满纸泪痕,不忍卒读——“修文高咏玉楼天,痛触吟怀望九泉。一字一珠皆血泪,无人能忍读终篇”^[1](P470)。汪嫔对士铨投入真挚的爱惜感情,是为程氏家族惜才。汪嫔的所作所为,时人多所评价。儿子程葆在其母故世第三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为她刻印《雅安书屋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赠言录》一卷,并请大学士阮元为诗集作序,阮元说汪嫔的“《示儿》八首,可铭座右,为立身居官职镜”^[1](P470—473)。比汪嫔略晚的诗词选家沈善宝(1808—1862)在《名媛诗话》中评论汪嫔:“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洵为一代女宗。”^[5](P364)鲍蕊珠与汪嫔情谊深厚,在表妹去世后书写《挽汪雅安妹》四首:“卓识高才总绝伦,程门那可畏斯人。(注:太宜人在徽,门户多所依赖。)都将母德寻常者(看),身后追思涕泪频。”^[1](P406—407)儿媳夏玉珍感谢婆母教导学诗,作《和姑示玉珍书》:“纱幔相依问起居,母才咸颂女相如。”^[1](P489)反映世人将汪嫔的文采比作司马相如。到了民国年间,许承尧(1874—1946)说汪嫔为徽州“咸同间女界之杰也”^[5](P366)。如果说阮元、沈善宝、许承尧是从社会大局出发,赞扬汪嫔为女性楷模、文学大家,鲍蕊珠则从家族角度,认定她的表妹是程氏家族的顶梁柱。可以说汪嫔富有大智慧,是程氏掌门人。她是一个典型,前述吴喜珠,被方淇苾认为“有功于方氏甚大”,故为她大书一笔,均是着眼家庭、家族贡献。

撰著《织余集》的吴淑仪,父亲是歙县诗人吴蝶庄,丈夫程秋渚,原籍歙县,寄籍仪征,流寓怀宁,儿子出息后定居扬州。吴氏早寡,“苦节抚孤”,培养的三个儿子,“皆成名诸生”,三子程荃,怀宁拔贡生,书法、篆刻家;长子掌衡,赴京谋发展。^[1](P480)一个既非官宦又非行商的流寓人家,可以想象不会有多少恒产,吴淑仪带着三个儿子度日必定艰难。白天操劳,夜晚儿子们进入梦乡,她又忙着为他们缝补旧衣裳,如《秋夜》所吟:“儿曹都到黑甜乡,检点寒衣趁夜长。添线可知慈母意,坚冰未至有严霜。”^[1](P481)诗里的“坚冰”似有双重涵义,一层固然是讲严冬的寒冷,另一层则表露守寡抚孤的坚定决心。冬天为儿子破旧羊裘补丁加补丁,知道破裘不能御寒,告诉他们养成耐寒品格,熬过冬天,就能迎来春天,盼望着光明前程。“羊裘已补重加缀,独夜含愁坐草堂……为语儿孙耐冷,春风不久律回阳。”^[1](P481)缝缝补补度

日,不忘教导孩儿做立志上进之人。为求温饱,长子程掌衡北上谋事,做母亲的既寄希望,又心酸,作《季秋忆儿北上》:“饥驱作客未全非,秋尽寒生日倚扉……计程终夜增华发,问卜闲窗坐落晖。曾定归装春信早,朔风犹恐雪沾衣。”^[1](P481)饥寒的南方人到北方去是不得已的,盼他返回,每日倚着柴门巴望,急得白发增多。母亲的心情就是这样。因为苦节抚孤,嘉庆十年(1805年)吴氏获得旌表。程氏家庭的维持、发展,功在吴淑仪。如果说汪嫔能令程门光大,吴淑仪亦以艰苦卓绝另一个程门起了支撑作用。

汪嫔、吴淑仪、吴喜珠都是“苦节抚孤”,以艰苦卓绝的辛劳奋斗,不仅延续了家庭,更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从而光大门庭,改变家庭社会地位,也使她们自身成为杰出人物。

四、江浙的生存环境为徽州贤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嫠妇“守节”,像吴淑仪得到朝廷旌表,汪嫔进入《清史稿·列女传》,是传统社会纲常伦纪的体现。后世批判者为节孝女子鸣不平,多着眼于她们观念上信守三从的不幸一面;女性史研究者以女性本身为主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将研讨推向深入与全面。笔者从中获得启发,觉得需要了解她们人生的多面价值:生活态度的自尊、生活能力的自强,以及观念的多面性。

如何理解徽州才女生存之道,不是简单的有无经济来源和如何开支的事情。生存问题,牵涉到生态环境、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生态环境涉及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条件、状况;政治环境涉及政权结构、职官与出仕制度;人文环境关系到文化产业结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实践、职业观念,以及文化普及程度。在清代,江南省(乾隆以前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省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间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丝绵织业居于全国中心地位;淮盐、浙盐,尤其是淮盐产区,为盐税大宗区;水路交通便捷,大运河贯通南北,供应皇家和八旗、京官的漕粮就由此输送。商业发展居全国之冠,行业众多,徽州商人、苏州(洞庭)商人名噪天下;餐饮业与娱乐业(茶馆、戏馆、浴池、妓馆)兴旺;苏州、扬州引领全国消费的潮流。此间文化兴盛,表现在人文茂盛,读书人多乃至女性学文化较为普遍;文人学者多,科举出仕

者众,江浙人几乎包揽状元;由科举而出仕,江苏、安徽、浙江人大量进入官场;学术事业兴盛,经学中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考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地理学等均出大家,诗学的性灵学派、散文的阳湖派、古文的桐城派均产生于此,乃至有扬州八怪、袁枚随园女弟子;文化产业发达,造纸业、印刷业、园林业都有名气。

这种大环境,为徽州才女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两个相当有利的条件。

首先,她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够具备文学艺术才能、技能,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为生存手段。江浙知识家庭多,有功名者和出仕者较多,还有一些“贾而好儒”的富商,有条件实践“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愿望,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不只是面向男儿,更兼及闺中女子。有文化的父母亲自教子女读书,有条件者聘请塾师施教,开明的父母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藩篱,令闺女从师学习诗词绘画,进入较高层次的学业。汪嫔就曾师从乾嘉间扬州两位最有名的诗家之一黄秋平以及他的夫人张净因。[1](P471)歙县人吴绣砚(1723—1785),“幼习诗书,间通文艺,与侄绶诏、恩诏同塾”[1](P485)。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妻子、歙县人方婉仪(1732—1779),学诗于父亲——太学生方宝俭、姑方颂玉和沈姓学子。①桐城人方芬(?—1805),从工于诗词书画的父亲方维翰学文化,又向处州知府、叔父方维祺的幕客金棕亭、储玉琴学诗,后来婚配于歙县人程约泉。[1](P430)祖籍歙县、寄籍平湖的鲍怡山有四位千金,擅长山水花鸟画的徽州老诸生程之廉游历到平湖,鲍怡山遂令女儿拜他为师,学画花草,其中鲍诗学得最好。②仁和人龚丽正先后任徽州知府、苏松太道,夫人段驯(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为女儿龚自璋聘请归佩珊教诗,龚自璋著有《圭斋诗词》,夫婿为歙县人朱祖振。[1](P438)结缡歙县人程绮堂的扬州甘泉人朱兰,著《梦香集》,学画于父亲朱瑶襄之挚友袁慰祖,学诗于原籍丹徒移居江都的王豫。[1](P503)婺源人、侨居扬州的金芳为

让女儿金环秀学习写诗,请俞补之指导,环秀乃在闺中吟成《留香小草》[1](P522)。家教与塾师的教导,产生了乾隆间杭州袁家三妹,京江鲍氏三姊妹,还有歙县人、两淮盐知事何秉棠的三个女儿何佩芬、何佩玉与何佩珠。何氏三女居住在扬州,佩玉嫁给当地人祝麟。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续集》中说何家姊妹“各擅才名,方之张氏七女、袁家三妹,何多让焉?”[1](P441)何家的文化状态,是徽州、扬州文化融合的标志与象征。③

其次,江浙人家有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出售文艺产品提供了出路。徽州有文化的女子,能够同男子一样成为塾师,于是有了江文焕、江士燮、石氏等一批闺塾师,特别是江士燮、石氏都是在徽州老家教书,说明当地有不少人家聘请塾师教育闺女。

扬州人郑板桥为自己书画标出价码,《笔榜》中明确宣布,绘画以尺幅大小论价,不得讨价还价,买画者不必套交情,不减价,不賒欠。④如此牛气,固然与其社会、艺术界地位及其为人风格有关,但亦表明江浙艺术品市场有了价值法则,有规可循。歙县黄氏家族书画迭出名家,黄文吉善花卉,其父遐龄工书,父子配合,文吉作画,遐龄为书写款字,“好事者以为古画,争持去。父歿,画亦减价矣”[4](P711)。歙县人项继皋,弱冠到无锡,从事典当业,喜绘画,“晚年嗜酒落拓,鬻画为生”[4](P908),均表明书画有市场。汪亮晚年能够卖画维生,在江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当然,其时艺术品市场很小,笔者在此只是说明艺术品可以、已经成为商品。

总括本文的意思,不外两点,一是徽州才女独立解决生计难题,是不争的事实。孙旭嫔、王玉芬、汪观定、汪嫔、吴淑仪、吴喜珠、江文焕、石氏、汪亮、江士燮,等等,都是凭借女红、闺塾师、画师与堪輿师的技艺才能,从事正当职业,挣钱养家糊口的,这充分表明女性具有谋生智慧和生财之道,从而实现了其独立谋生求得生存的愿望。家中没

① 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32—433页;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第831—832页。

② 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07页;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第840页。

③ 关于徽州女子的读书机会,唐力行在《苏州与徽州妇女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明清以来“徽州是文化昌盛之地,一般殷富人家待字闺中的女子总是就着私塾读过几年书,腹中有些文墨。”参见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第602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④ 板桥《笔榜》中的润笔价码为:“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并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界佳。礼物既属纠缠,賒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言语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语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参见卞孝萱:《郑板桥全集·板桥集外诗文集》第243—244页,齐鲁书社,1985年。晚清,周存伯、吴平斋曾效法郑板桥《笔榜》中的做法。

有了作为顶梁柱的男子,她们就是家庭顶梁柱。不仅如此,她们还是理家能手,教育子女健康成长,以至成为社会人才。她们的所作所为延续了可能破灭的家庭,乃至令其兴旺,光大门庭,令人刮目相看。一句话,她们有独立生存能力,有创造

力,对家庭和社会都作出了贡献。二是江浙社会为她们独立谋生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这是徽州贤媛幸运之处,是其他地方的贤媛所不易谋求的。

参考文献:

- [1] 傅瑛. 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Z]. 合肥:黄山书社,2010.
- [2] 蒋良骐. 东华录(卷30)[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清世宗实录(影印本)[Z]. 北京:中华书局,1936.
- [4] 许承尧. 歙事闲谭(下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 [5] 许承尧. 歙事闲谭(上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Virtuous Women's Family Management and Survival Strategy in Huizhou in Qing-dynasty

FENG Erkang

Abstract: Many virtuous women have the ability of family management, such as taking care of the old parents and maintaining the poor family when they keep unmarried or get late marriage, living by spinning and weaving which the women in poor family are good at, earning the families' bread like a man on being teachers in private school, geomantic masters (Feng Shui Shi), painters who sell their paintings. Their abilities of family management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good ability of independent survive. They ean their bread by theirselves, which is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Jiangzhe area are developed, which provide two advantages for virtuous women in Huizhou to make a living. One is that many women could get a goo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skill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other is that there is a big market of the teacher in private school for women and work of art in Jiangzhe area, in which the virtuous women in Huizhou could engaged in education and work of art production.

Key words: virtuous women in Huizhou; living environment; survival strategy